

王士元教授专访(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

叶教授:

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王士元教授来此。我先来介绍一下。王士元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学系伟伦研究教授，同时隶属于东亚研究中心、翻译学系及语言学暨现代语言学系。

进入中大前，王教授于 1966-1994 年间担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语言学系教授，并于 1996-2004 年间担任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工程讲座教授。王教授是位卓越的学者，他的影响和贡献在海内外都备受肯定。他也是位开创者，成立了俄亥俄州立大学语言学系和东亚研究学系，并担任两系的首位系主任。他还创办了《中国语言学报》，是汉语语言学发展上的核心功臣。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于 1992 年首创时，他就被选为会长，现在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柏克莱时期，他担任过赵元任中国语言学研究(Chao Yuen Ren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主任及研究院教授直至 2000 年。

王教授至今获颁的荣誉、奖项无数，包括古根汉奖金(Guggenheim Fellowship)、两次的史丹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t Stanford)奖金、瑞典国家教授(National Professorship)奖助、意大利贝拉乔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at Bellagio)访问研究学人、京都国际高等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奖助。他也是北京大学荣誉教授。

他的著作等身，遍载专业期刊学报、百科全书条目、以及科普杂志上，包括《美国科学人》(*American Scientist*)、《自然》(*Nature*)、《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台北的《科学人》和北京的《科学中国人》。他的文章曾以中、英、法、德、意、日文等语言刊登。

他最近荣获的奖项包括北大颁发的荣誉教授，及台湾的金语言奖(Golden Language Award)。近几年来，王教授与生物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合作，共同探讨语言起源及语言分化的模式。他在中大继续着跨学科视野的研究，触角广及工程学、语言学和生物科学。

王教授你好，恭喜你最近获得的荣誉。我们都替你高兴。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王教授:

我这个月真的是非常幸运。四月九日，也就是几个礼拜前，我去了北京，得到了北大颁发的荣誉教授头衔。我在北京有许多朋友，因此很高兴跟他们重逢。上个礼拜，我去了台湾。台湾科技大学举办了一场国际应用语言学研讨会，并颁了个金语言奖给我。

叶教授:

真是无比的荣耀！

王教授:

能获得大家的肯定的确值得高兴。

叶教授:

没错。我们想听你谈谈《中国语言学报》的沿革。你是这个知名国际学报的创办者，一开始草创阶段是什么情况？是什么启发你使你创办这个学报的？

王教授:

那是 1970 年代，1973 年，在北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邀请下，我第一次有机会回到中国讲学。当我再回到柏克莱时，我体会到那时中国已有许多出色的语言本质的研究，其传统甚至可溯及两千年前。但是这个研究传统却从未和国际上的语言研究有过充分的学术往来。所以当时我找了柏克莱的院长谈，他对我的建议很是赞同。有了院长室的支持，我们就开始办学报了。一开始，的确是相当简陋、克难的。我们得用手写方式处理汉字，因为那时还没有中文文书处理器，所以很像在修车场打杂工一样，但后来各地的支持越来越多，学报运作终于慢慢趋于稳定，我也很欣慰。两年前，中大表示愿意接手出版学报，所以我们便把编辑部搬至校园内。因此基本上现在的学报有两个总部：一在柏克莱，二在中大这儿。

叶教授:

可以跟我们谈谈早期创刊的日子吗？那时曾遭遇哪些问题，又如何克服那些障碍？

王教授:

那年头是个很难在政治立场上取得中立的时代。也许有人以为，学术性的刊物不应该有这个问题的，但那时我觉得，既然大部分的研究，尤其是汉语研究的学者多在大陆，所以学报应该采用简体字和汉语拼音。这样的决定却让台湾的政权很不高兴，所以我的学报便被列入了黑名单。我在台湾的许多好友，都无法轻易看到《中国语言学报》，我自己在那段时间内也成了不受台湾当局欢迎的人物。但这些当然都随着时间过去了，我想现在这个学报在海峡两岸同样受到欢迎与支持。

叶教授:

你可以说是在背后统合这一切的一股力量。你才刚在台湾获奖，这表示北京和台湾都肯定你的贡献。

王教授:

是的，我认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分歧其实都是人为造成的，政治上的产物不应在学术上起作用。所以当时在柏克莱，我很早就有机会把两岸杰出的学者聚在一起。一开始他们跟

对岸的学者接触时，好像很不自在，但慢慢地，大家都体认到，学术归学术。

叶教授:

你可以说说学报发展的几个重要里程碑吗，也许从中国语言学的大框架下来谈？

王教授:

我觉得赵元任教授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功不可没，所以我们发行了第一期学报后，我个人感到很骄傲，便亲自拿了一本到赵教授山上的寓所去送给他，而且书的扉页上就写着：「献给赵教授」。他那时非常高兴。

叶教授:

可以告诉我们你和赵教授在柏克莱共事的经验吗？

王教授:

我个人是非常仰慕赵教授的。他是个很内敛的人，话不多，但一旦开口，说的东西总是发人深省。赵太太则是个活跃的女性，颇有自己的一段历史。我记得她会指着丈夫说：「你看，你写了多少篇论文，多少本书，而我只出了一本食谱，你的读者却没有我的一半多。」她的食谱叫《中国菜怎么煮怎么吃》(*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他们住在柏克莱的山上，有一次我到他们家作客，那是刚认识他们不久后，他们的房子有三层楼，我上楼要去洗手间时，找不到电灯在哪里，所以就摸黑进了厕所去洗手，突然间竟听到浴缸里有水花溅起来的声音，吓了我一大跳。我于是摸索着要开灯，终于找到了，开了灯后，我看到浴缸里养了三四条大鱼，在那里游着而溅起水花。赵太太很喜欢烹饪，如果偶尔有客人造访，她就上楼到浴缸里捞一尾鲜鱼上来煮。赵先生则花很多时间弹琴，所以他家是个音乐世家，最明显的影响是他们的女儿卞赵如兰，她算得上是结合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的大师之一。而且我刚刚才听到你说，赵如兰捐了不少音乐收藏给中文大学。

叶教授:

她其实把毕生收藏的音乐书籍、乐器、乐谱等文物都捐给了中大，我们都很感谢她。我想所有中大人都会很感谢她的。

王教授:

一定是叹为观止的一笔收藏。

叶教授:

赵如兰的音乐细胞遗传自父亲赵元任，但赵先生除了懂音乐，也是个数学家、语言学家，你似乎也跟他一样兴趣广博。

王教授:

我想自己深受他做学问的方法影响。赵先生在哈佛大学的数学物理系拿了学位，却做了许多语言和音乐的研究。二十世纪中叶在中国很受欢迎的一首歌〈教我如何不想他〉，就是他作曲的。赵教授辞世后，当《语言》(*Language*)要我写一篇他的颂词时，我想到最好的颂词结尾，莫过于刊出他所写的歌来。《语言》告诉我他们从不印乐谱的，可是当时的主编是我一个好朋友 **Bill Bright**，我于是说，为赵教授破例一次吧，他便答应了。所以他们在我写的颂词结尾，把歌曲的最后那一句以五线谱的形式刊了出来。

我想语言研究的确是最恰当的跨学科研究。赵教授本身就是个绝佳的例子。我以为，做学问最终的目的，还是在找出我们是谁，人类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最独一无二的点就在于语言。如果你只从一扇窗看语言，只会看到一部分；如果从另一扇窗看，又会看到其它部分。这就好比瞎子摸象一样。可是如果我们透过许多窗口来观察，把这些不同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就能看得更全面清晰些，更深入了解语言为何物，藉此也得以更深入理解人类的本质。

叶教授:

所以这是驱使你从事研究的一股动力。目前就语言的起源而言，有些什么新发现和重大成就？中国语言学和探索语言起源之间，又有些什么关系呢？

王教授:

我在语言学方面所接受的早期训练，尤其是在密西根大学当研究生时，对于语言是什么，学界仍充斥着欧洲新语法学派的观点，也很受索绪尔(*Saussure*)对语言系统看法的影响。那时，我也很为达尔文的演化论成就所著迷，当我透过演化论看语言时，发现语言间存在诸多差异，诸多变迁。新语法学派所说的音变是没有例外的，而布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也说过，音变的单位是音素。所以我提出实验性的想法，也许是词汇在变。一旦共有同一个音素的许多词汇重组了，看起来就会像是音素改变了。我所提出的这个看法，很多同事就称为词汇扩散，从那时起，我又拓展了视野，继而想到，也许不只是音在变，词素、句法也会变，语言里的任何改变都是由词汇开始。我想持这种观点的也许还是占少数，不过却值得从这种观点来看语言。

Matthews 教授:

王教授，我知道你也曾受业于已故的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教授。他已经离我们远去，也许你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跟他学习的经验，或谈谈他如何影响你做学问。

王教授:

格林伯格对我的思想是另一个重要的启发。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的经验特别有意思。那时我是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的大一新生，格林伯格则是刚从非洲返美的年轻讲

师。你也知道，常春藤盟校里，大家都很庄重，教授总是西装笔挺的，非常体面，跟我后来熟悉的柏克莱大不相同。有一次我选了格林伯格的课，第一节课不是平常那样二三十个学生，只有五六个人，我们坐在课堂里等着，上课钟响都过二十分钟了，才有个看似邈邈的年轻人抱着一大叠讲义冲进教室来，他就是格林伯格。他完全高估了教室里的学生，不管是学生的人数还是能力，他的讲义上有个题目是某些非洲语言的构拟，那些语言我们听都没听过，不过这表示他多么投入自己的研究中，虽然我觉得那门课颇难，因为他偶尔会恍神地陷入沉思中，无视学生的存在，但我还是上得很有兴致。

之后，我很幸运的还能跟他很亲近，因为我搬到柏克莱时，他已经搬到史丹福了，我们相距只有一小时。我常开车去探望他。你知道格林伯格是具备演奏水平的钢琴家吗？有时晚饭过后，他会坐在钢琴前弹几首优美的奏鸣曲给我们欣赏，我们也时常一起到史丹福的教员俱乐部去吃中饭，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研究能获得他的认同。记得有一回，我的文章发表在《国际美国语言学报》(IJ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上，那篇文章谈的是声调，后半部探讨了潮州话变调的现象，我知道潮州话是叶教授早年的语言。潮州变调是个很有趣的音韵现象，如果不看两个短的入声，共有五个长调。这五个长调如果变了调，那么好像彼此追逐绕着圈跑一样，所以有时就称为闽语变调圈(Min tone circle)。

我当时很骄傲自己想出了一条优雅简洁的规则，来描述这种变调圈。我志得意满地要给格林伯格看，抓起史丹福教员俱乐部的餐巾纸就开始振笔疾书，格林伯格很耐心地听完后，接着回答：「然后呢？」当时我非常震惊，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成就明显摆在他眼前。格林伯格在问的，其实是个层次更深的问题。他说：「你给我看的是形式上的一招妙计，可是我对语言的本质学到了什么，我从你的小聪明又能学到什么关于闽语的本质？」我那天回家后垂头丧气的，想了又想，一想再想，突然领悟到他说得多么正确。过度抽象、形式的东西，让我们脱离了语言的实证基础，也让语言学研究误入歧途。我再一次去探望格林伯格时，告诉他我终于懂他的问题了，他非常欣慰。

叶教授:

赵元任和格林伯格都是语言学界屹立不摇的大人物，我想听听你对他们持久影响力的看法。你觉得他们对语言持什么观点？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王教授:

我想从他们身上，可以清楚看出，语言不是个独立自主的体系，而是深植于文化中，深植于人类文明、人类认知中。赵先生念的是数学物理，格林伯格拿的则是西北大学人类学的学位。他们两人都为语言的研究带进了有趣、有益的新视野。

另一个我有幸相交的大师级人物，是位人口遗传学家，名叫 Luca Luigi Cavalli-Sforza 。我可是费了一番工夫才记牢这个名字的。

叶教授:

你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听啊。

王教授:

有一次某人在柏克莱召集了一个会议。有人想主编一本书，Cavalli 也受邀写一章讲人类基因的，而我则负责写语言。那本书后来一直没有编成，但 Luca 和我却成了好朋友。我们常彼此探访，有时我开车南下，有时他开车北上，他让我体会到，人类的史前史对于理解语言的史前史至关重要。人类行为的起源也可以启发我们对语言起源的理解，反之亦然。

我学术生命中的这三个巨人，只有 Luca 还健在，我们有些人便一起筹划替他争取荣誉院士的头衔，中央研究院通过了我们的申请，所以如果健康条件允许，Luca 今年夏天也许会到台湾去，他将是中研院首批荣誉院士。我们都很替他高兴。

Matthews 教授:

我记得你当初来香港的时候，已介乎退休阶段，但你那时却深入南中国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的田野调查。可否告诉我们，是什么因素推动你从事那些田野工作，那些调查又有些什么发现？

王教授:

好的。我没办法想象自己会退休，因为我们做的研究这么的有趣。其实早在我还在柏克莱时，就读过中国一位人类学家费孝通的故事。费孝通是在一九三〇或四十年代去了广西大瑶山研究瑶族。他跟新婚的太太一起到大瑶山去纪录当地民族，是一段很动人的故事，但由于接连几个意外，那次的田野工作让他痛失爱妻，这件事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之后，我认识了李方桂教授。李教授对中国的语言如何定位自有一套看法，而苗瑶语族的地位一直颇有争议，应该归为汉语吗？还是南亚语系？或是南岛语系？甚至是自成一个语系？

费孝通的故事和苗瑶语言的争议，都在我脑海里盘旋，我在柏克莱时，已经试着做些田野调查，可是太不方便了。所以当我最后决定卸下柏克莱的教职时，我想这该是做田野的最佳时机。只要在香港定居下来，就离那些濒危语言很近了。所以我才搬到香港没多久，立刻就南开大学的石锋教授及几个研究生前往大瑶山，录了很多瑶的语料。那时起，我们的兴趣也拓展到云南的许多语言。我在城市大学有过一个很杰出的学生，现在已经在北大任教了，他是汪锋，他就研究了另一个备受争议的语言——云南的白语，研究它的归属问题，以及一些相关的历史语言学的理论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些语言在两方面特别有意义。一方面，我们得要解决语言演化的科学问题，

知道什么是纵向传递，什么是横向传递。另一方面，我们也该留意那些快速消失的语言。那里的人告诉我，只要多铺一条柏油路，就会丢失一种语言。因为村民一旦嗅到了外面发财的味道，通常就不太愿意传承自己的文化遗产，传承自己的语言。一旦失去了一种语言，也就失去了一种文化。这就是促使我深入那些村落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一开始为什么会横渡太平洋在此落脚的原因之一。

叶教授:

你知道我们语言学暨现代语言学系还算是很年轻的学系，因此我们很希望好好训练下一代的语言学学生。你能否给我们一些建议，一些睿智的话语？我们该如何训练他们，让他们既有理论的基础，又能实际应用语言学的知识？

王教授:

我想，一个人如果有活跃的求知欲，应该不需要太多动机就会去研究语言，因为这是理解人类本质最有趣、最有挑战性的知识领域。不过很不幸的，许多语言学系，尤其是在美国，对语言学一直有一种误解，大家都急于追求最时髦的东西。他们把全副精力与功夫，都放在追随最流行的理论、写出最新颖的公式上。这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耍小聪明，但却把精力远离了真正的语言本质。

刚刚我还在翻阅你和 Steve 两人所写非常好的关于双语儿童那本书，我觉得这就是个可贵的贡献，因为这本书正是理论与实际并重。这两者原本就分不开的，犹如铜板的两面。所以这本书荣获 Leonard Bloomfield Prize，的确是实至名归。就像 MacWhinney 和 O'Grady 在书的封面上所提，你们的研究是个突破，因为许多人谈双语研究时出发点很不同。我翻看了几章，发现每次 Sophie 指正 Alicia 时，她的话总是很有见地，为我们如何看待语言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观点。所以我认为，语言习得是了解语言为何物的基本课题，而汉语的研究圈又特别肥沃，因为有这么个实验室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Steve 的兴趣在语言类型学，还有我们之前谈过的濒危语言。那又是另一个及时、重要、不容忽视的课题。我自己最近越来越感兴趣的，是语言生物基础的问题。每个孩子发育的阶段大体是一致的。什么时候他开始更深入自己的母语，而渐渐地分不清其它语言间的差异？最早的词汇是何时出现的？最早的句型构式又是何时开始的？这些发展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大脑的成熟过程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越是知道大脑如何处理语言这么复杂、精密的东西，就越能了解语言。我觉得这些研究语言的实证方法都应该好好配合。

叶教授:

的确。这一点相当重要，尤其是当我们去各校宣传、推介语言学时；我们希望大众和学生们都知跨学科的语言学有多重要。语言学在人文学科里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在科学中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人文学科里最科学的一门学科。

王教授:

说得非常好。

叶教授:

我们(语言学)是科学与人文的桥梁。除了你，我们也找不到更能具体代表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最佳人选了。你是跨学科研究中最核心的人物，因为你曾经与工程师、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合作从事过这么多研究，当然更别说是和其它领域的语言学家合作了。我想语言学的未来要能蓬勃发展，就必须积极从事跨学科的学术追求。

王教授:

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只有看到各学科之间的新联结，知识才能进步。一旦我们看到了新联结，并把原本不同领域的两个学科整合起来，那就是智识上的一大革命。我觉得科学史就是循着这样的轨迹前进的。当我们理解，天体的运行和苹果的往下坠受到同样引力驱使，那是科学上的一大突破。当我们明白，电和磁基本上是同一种现象，只是以不同的频率在运作，那也是一大突破。当人类了解，我们可以研究同位素的放射性衰变，并应用在树木和头骨上以研究人类史前史，那又是一大突破。当 Swadesh 说：「也许我们也可以这样研究语言，用基本词汇法来替语言分歧定年」，那也是一个突破。可是语言比树木、头骨复杂得多，因为它是种人类行为，人类行为总是比物理现象存在更多变量。不过，正是跨学科视野才把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物结合起来，赋予我们增进知识的绝佳机会。我觉得语言正处在这一切的中枢。我认为系与系之间的分界是没有意义的。这是考古系、这是语言学系、那是心理学系。我想知识应该一家亲，只不过我们尚未把许多片段结合在一起罢了。

叶教授:

我们晓得你对语言和大脑、语言的生物基础等课题深感兴趣。请你谈谈这方面的研究。

王教授:

如果有人上健身房去锻炼，那么他的肌肉会变得强健结实。环境或经验都会塑造我们的身体。如果有位钢琴家时常在键盘上弹奏，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大脑里，控制手指头动作的运动脑皮质，一定比一般人的大。现在假设有个小孩生下来就说一种语言，那个语言有自己的语音、词汇、语法句型，这些都是众多的经验与练习，远多于那位在键盘上练琴的钢琴师。那么这些经验会如何形塑他的大脑？这就是我想探索的大问题。语言怎么塑造替语言服务的大脑？这个问题达尔文在他 1871 年的书里已经提到。可是最近我们才有适当的研究大脑的科技。

汉语在许多地方独一无二，最特别的是它有声调，还有它不用字母，而有自己一套书写系统。所以目前我们主要是用 EEG 的技术，来看声调如何影响一个人对声音——如对音

乐的感知。还有写汉字也是，会不会影响我们对图形模式的感知？事实上，我的同事彭刚上周末才从广州回来，他到广州几个音乐学院去做实验收集资料，看看说声调语言的人是不是比较容易辨识绝对音高。这个问题最早是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位心理学家提出，名叫 **Diana Deutsch**。她最初发现，好像有此可能。我们想验证她的想法是否属实，所以我们大规模的采集样本。要是我们能大致理解一个人说的语言如何形塑他的大脑，而大脑又如何塑造我们的行为，那么我想，就是语言学对理解人类所作的一大贡献了。

叶教授:

真的很有意思。也许再过十几二十年，我们会有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王教授:

我深深期盼的确如此。

Matthews:

你可以说是追随着赵元任和格林伯格的典范，把语言研究和我们可以从音乐家身上所习得的东西相结合。

王教授: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有能力做得比他们更好，因为我们现在有新工具了。想想伽利略要是没有望远镜怎么办。如果没有脑造影技术，要怎么研究大脑呢？我们研究大脑所需的望远镜其实是二十、三十年前才开始有的吧。所以这个新科技，的确让今日的研究进展与从前的不可同日而语。

叶教授:

你给我们带来了一本书。这是本非常重要的书，叫《永远的 POLA》。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王教授:

POLA 是一个破破烂烂的老房子，在加州大学的校园里。POLA 是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的简称。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加州作研究的时候没地方，因为语言学系那座楼已经住得满满的了，所以他们就给我一座破房子叫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中国语言学报》就是在那儿开始发刊的。我们有那一块地方以后，很多对中国语言学有兴趣的朋友经常来看我们，所以差不多每半年、每年我们就开会，开一个非常轻松的、非常随便的会，比方曾志朗差不多一开始的时候就经常来，朱德熹、林焘、马学良从北京；梅祖麟从康乃尔(Cornell)；丁邦新从台湾。所以书名《永远的 POLA》也许是曾志朗建议的，他很喜欢那种非正式却深入交流的精神。

叶教授:

非常有意思。

王教授:

非常有意思。对，是一种精神。

王教授:

他说他回台湾之后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个像 POLA 那样的地方，再重复那种精神，但是后来他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因为他做了校长，又做了教育部的部长了，就没有时间了。

叶教授:

里头有一个乐谱，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王教授:

哦，在哪里呀？

叶教授:

是一首歌，叫「秋之歌 Autumn Song」。

王教授:

对。

叶教授:

词跟曲就是王士元教授作的。可能很多人不晓得你也是一个作曲家。

王教授:

我不大懂这个东西，不过我有时候自己哼哼嘛，哼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调子，加一点词就不错，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加几句英文词。后来曾志朗来他说，诶，让我把它翻成了中文，我觉得他的中文翻的比我的英文好得多，所以他们就把它放在这本书里。好像他们也放了一个照片。

叶教授:

那你培养了不同年代，很多中国语言学里头的学生，还有后来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专家，散布在不同的院校里头，可以也说一说。

王教授:

我觉得这一方面最让我高兴的就是一来的时候他们是学生我是老师，不过一年...过了一两年慢慢的我们就变了很好的朋友，况且这些朋友，是几十年的朋友，不只是他们读书

时候的朋友。有过一些非常杰出的人才。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时候，第一个博士生是一位日本人，他叫桥本万太郎，日语读法是 Hashimoto Mantaro。那个时候我很年轻，他比我大两、三岁，虽然我是他的老师，但是他很多地方懂得比我多，他是在日本学汉学，所以很多中国传统的学问他都很了解。从他算起，我收过的博士生现在该有四十个左右了吧。

叶教授：

谢谢王教授送一本书给我们。这本书的书名很有意思的：《永远的 POLA：王士元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里头大多是王老师他那么多年来培养出来的非常优秀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班专家学者，他们对王老师的一种致敬。那我们请王老师来介绍一下。里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图片。

王教授：

这本书是我两个好朋友编的。何大安那个时候是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的所长。那么曾志朗可能那个时候是台湾的教育部部长。他们两位都是非常杰出的学者。何大安对于汉语的历史是权威。方言、雅言，种种传统语言学当中的精髓，他都是掌握得非常好。曾志朗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好像是一九七十多年间，到柏克莱来看我，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说，你们语言学家为什么只是研究口语，为什么一点都不注意文字。我说，啊，你是心理学家，你注意文字，我在旁边，能帮什么忙就帮什么忙。那个时候呢，大家以为，汉字啊，因为不是字母拼出来的，好像直接看着字就达着语义，根本不经过语音的。曾志朗说，这个大概不对。所以他就跟我做了一些很有趣的实验。他很会做实验。我就在旁边，帮了他一点。

那么，那个时候，那篇文章叫做 *Speech Recoding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是 1977 年。那个是汉语阅读的第一篇比较科学性的文章。从那个时候起，很多文章就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看汉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语音在里面。这里头有很多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不能够一一而及。比方，洪兰，就是曾志朗先生的夫人，她也是个非常好的心理学家。谢信一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又是语言学家又是个诗人。他在夏威夷大学出了好几本非常美的诗。丁邦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经过多次的讨论，我觉得我们有很多非常相同的地方。这里文章相当多，我不能够每个都谈。

我刚才讲到丁邦新，他是我四十多年的好友。那个时候我跟郑锦全有一篇文章是讲一个闽方言。那个闽方言叫做潮州。潮州里面的声调，正在变化。我们觉得那个变化其实就是一种词汇扩散。我们这个看法也得到当时美国语言学会会长 Bill Labov 的认同，他在当年的年会致词上就认可了那个词汇扩散现象。可是丁邦新提醒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考虑到外来的方言接触的影响。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后来有别的材料看得到了，我们就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其实丁邦新讲的也对，我们本来讲的也对。所以我们现在对于潮州的这个变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每个语言里头都有不同的层次。闽南话里头就有很多层次。

况且这些层次的互动，渗入了每一个个别的音节。比方我们如果把一个方言里面分文、白两个层次，那么同一个音节我们可以把它分三部分：声调、声母、韵母。有的音节呢，声调是文，声母跟韵母是白。有的音节呢，声母是文，声调、韵母是白。所以三个东西，每一个可能有两个值，二的三次方是八，八种可能都有。连金发研究了这些现象，把它叫做双向扩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Matthew Chen（陈渊泉）现在是，我觉得是，Tone Sandi 声调变化的一个权威了。他一步一步研究了很多不同的方言里面的变调。Weera Ostapirat，这是一个泰国名字。但是他是一个在泰国的华侨。我这个发音不准，所以我就叫他许家平，一个中国名字。他研究侗台语，是一种南亚语系。沈锺伟研究蒙古字韵。我看这里头也还有很多相片。有两张是 2004 年我到北京的清华，去讲演。前几天，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到那去讲演之后，很多人听了觉得很兴奋，很有意思。他们最近，大概今年年底，会出一本很大的书，关于语言演化跟大脑的关系。由江铭虎、王琳两位老师主编，收集了大概有四五篇文章。我现在正在帮他们看一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更改的地方。所以我到一些地方去，有时候他们之后会说，王先生又来给我们播种了。是的，有时候的确像是在播种。因为，一般我的朋友年纪大了听不进去什么东西，但是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听进去他会感到很兴奋，他会觉得要努力了，这是让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也是教书所特有的一种乐趣。

叶教授：

这个是使得我们非常兴奋的，听到你的工作，你的演讲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想请王老师也说一些话来鼓励我们这新的系，语言学暨现代语言系，还有我们很多年轻的学生，他们要进入我们这个学科，应该如何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王教授：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很高兴叶老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一般的人他只管他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要往远的地方看。我觉得往远的地方看，香港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地方。因为一，它有中国语言学的两千年的传统在这里；二，它充分的得到西方的种种语言学的成就、理论。所以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希望的办法。我创办《中国语言学报》的时候，就讲过这些话。西方语言学和中国语言学，让它们百川汇流吧。我觉得香港在这方面是一个最理想的，让这两个传统汇流的地方。

我们知道，现代语言学大概可以说是从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1786 的那个讲演开始。以后呢，语言学最精彩的发展，都是在欧洲。比方 Schleicher, Brugmann, Verner，这些伟大的语言学家都在欧洲。所以我们可以说 19 世纪的语言学基本是在欧洲，欧洲领先的。那么 20 世纪呢，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像 Leonard Bloomfield, Edward Sapir, Joseph Greenberg，以及从俄国去美国的 Roman Jakobson。先是结构语言学，又是生成语言学，

等等。基本上 20 世纪是美国领先。所以我一直最大的愿望，就是 19 世纪是欧洲，20 世纪是美国，21 世纪能不能到我们这来。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一，他们工作要有方向，要有历史感、使命感；二，我们大家在一起，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不是能够让 21 世纪的语言学跟一些相关的学科紧紧地结合起来，做得更科学，拿东亚，拿中国，拿香港，做一个语言学的国际学术中心。这就是我最希望能实现的。

叶教授：

哇这个太好了，我都没有想到。王教授的愿景，他的愿景里头有这么一个崇高的看法。就是我会看到现在，无论是经济还是很多领域里头，中国扮演的一个角色都是举足轻重的。很多强国，很多领先的国家都往中国大陆看。那我们语言学也可以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王教授：

是啊。那在朝这方面努力的时候，你们两位的儿童双语研究中心(Childhood Bilingualism Research Centre)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

叶教授：

我们任重道远。谢谢。谢谢王教授。